

芒 矡 英 雄 的 黎 明

□ 曲柄睿

今日位于豫、皖、苏、鲁四省接合之处的河南永城，就是秦汉之际的芒砀山所在。汉高祖刘邦从此起事，三年平秦、五年灭楚，创立汉家天下。

那些从芒矡就追随刘邦的父兄，是刘邦最为倚重的核心力量。他们改变了春秋战国以来立国传家者限定在贵族之间的局面，开创了“布衣将相之局”，并奠定了汉朝稳固的政治基础，形成伟大的历史变革。

秦失其鹿，天下共逐之

秦王嬴政于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，建立起中央集权的秦王朝。他自认为功德远胜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，定“皇帝”为号，称“始皇帝”。秦能统一六国，与商鞅变法有莫大关系。其核心主张，便是加强中央集权，奖励耕战。秦国由此变成了一架杀气腾腾的战争机器，东方六国莫能与之争锋。

商君之法，强国之际又倡导弱民。《商君书·弱民》提出“民弱国强，国强民弱”，“有道之国，务在弱民”。王子今先生认为，商鞅求民弱，“是要让民众朴实专一，简单麻木，恪守法轨，服从控制”。

秦国长期奉行的国策，自然不会在秦始皇的手中终止，民众渴求平静生活的心愿，也难以在此刻得到实现。统一六国后，秦始皇北逐匈奴，南取百越，兴修咸阳宫室、长城等一系列大型工程。这一切的基础，是秦强大的军事实力。正如贾谊《过秦论》所谓“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，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”。

秦始皇死后，秦二世依旧滥用民力，尤以役使过去东方六国民众为最。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，反抗秦政的起义军都兴起于东方六国故地。在原来的秦国本土，反倒没有揭竿而起的义旗。

这种情况自然与地理位置有关。《史记》记载主父偃评价秦始皇兴发全国民众运粮至北

部边境，所谓“起于黄、睡、琅琊负海之郡”，损耗达到“三十钟而致一石”。很明显，原有六国地区距离秦国北部边境较秦国本土更远，转运成本就更高，民众负担就更重。结果是“男子疾耕不足以粮餉，女子纺绩不足以帷幕”，进而出现“孤寡老弱不能相养，道死者相望”的局面。

秦对东方六国的政策，与当地的旧风俗也形成尖锐的对抗。1975年出土于湖北云梦睡虎地的秦简，揭示了秦法与楚俗之间的矛盾。代表秦权威的南部守腾，向南部吏民训示的《语书》是其有力证据。《语书》中说：“今法律令已具矣，而吏民莫用，乡俗淫佚之民不止，是即废主之明法也。”实际上，南郡一地早在秦昭王时期（前278年）已划归秦有，迄《语书》发布时，已逾半个世纪。此时，“秦法”与“楚俗”之间的区别仍需要郡守反复申明，足见秦楚之间的矛盾了。其他国家与秦国的矛盾，亦可想而知。

在秦的重压之下，民众的反抗从未停止。秦始皇二十九年（前218年），他在东游途中，于阳武博浪沙“为盗所惊”，这是韩国贵族后裔张良策划的一次暗杀事件。秦始皇三十一年（前216年），他微行于咸阳，“夜出逢盗兰池”，这恐怕仍不能视为单纯的治安事件。秦二世元年（前209年），陈胜、吴广在大泽乡起义，掀起了武装反秦的浪潮。

正所谓“秦失其鹿，天下共逐之”。陈胜自立为王，号张楚，意在借重楚国强大的民力及依靠楚人仇视秦国的心理。陈胜又派人收复六国故地，并将这些出身平民的人立为王，镇

抚当地。这时，秦的力量依然强大，陈胜很快被击败。此后，楚国贵族项梁及其侄子项羽，拥立楚国旧贵族熊心做了楚怀王，重新立起“楚”的旗号反秦。在楚国故地，响应陈胜号召出现了许多反秦的义军。兴于芒矡山泽中的刘邦的队伍，就是其中的一支。

布衣将相之局

刘邦为人落拓旷达，喜欢饮酒，不好从事农业生产。因性格豪爽，刘邦团结了一批朋友，而担任泗水亭长一职，又使他有接触到秦政权中的一些基层官吏。这些布衣时的旧相识，成为刘邦队伍的核心力量。

《史记》记载，刘邦的连襟樊哙，原本为乡间屠狗之輩，最为他倚重亲近，是后来夺取天下的主要将领之一。同为刘邦大将的周勃，本靠编织养蚕工具为生，时而去乡间丧事中吹箫。大将灌婴，以贩缯为业。那些后来在战争中加入到刘邦阵营中的人，虽名垂青史，出身也未必有多么光彩亮丽。韩信本是乡里无业之人，依靠亲友接济度日。陈平更有盗嫂受金的污名。对这些情况，刘邦统统不予考虑，量能授官，因才施用，方才充实，壮大了自己的力量。

注意到这一点，就能发现刘邦集团逐渐强大的原因之一。英雄不问出处，大争之世，有所谓“画半策而缗万金，开一说而锡琛瑞”的传统。刘邦目标明确，少有顾忌。正因为如此，每能得臣下死力。

出身布衣的将相也未必狭隘，于乱世之中

往往有惊人之举。刘邦用人不拘一格，在乱世中形成大开大合纵心所欲的政治风格。数百年后也有知音。

汉末群雄并起，曹操为获得政治、军事上的优势，三度颁发求贤令，不拘风评，不取声名，唯才是举。他说道，“陈平岂笃行，苏秦岂守信”，“萧何、曹参，县吏也；韩信、陈平负污辱之名，有见笑之耻，卒能成就王业”。正是将汉高祖刘邦视为楷模，官渡之战前，曹操帐下荀彧、郭嘉分别给出了对比曹袁实力的战略分析报告，即“四胜论”与“十胜十败论”。曹操用人不疑、信人任人的选才风格，被评价为曹操远胜袁绍的重要优势之一。十六国时期后赵开国君主石勒，喜听人谈汉史，对刘邦风采赞赏非常。曾对人说“朕若逢高皇，当北面而事之，与韩彭竞鞭而争先耳”。刘邦的政治风格与君臣相得，成为后代有才略政治家的效仿对象。

清代学者赵翼评价汉初的布衣将相之局是“天地间一大变局”，改变了此前世卿世禄的局面，为后代“征辟、选举、科目、杂流”等选拔人才的方式扫清障碍。则刘邦及其布衣将相的历史功绩，又远非建立汉朝一项。

郡县与分封并存

田余庆先生在他著名的《说张楚》一文中指出“非张楚不能灭秦”“非承秦不能立汉”。前者指的就是灭秦以楚地气势最盛，而后者指的则是刘邦必承秦制方能击败项羽。

秦亡之后，项羽主持了分封天下诸侯的

从意大利历史看西方

□【意】弗朗西斯科·郗士/著 曹颖新/译

意大利这面镜子

中国人一直相信历史。从上古时代、从孔子和孟子的时代、从编订了《礼记》的周代，中国就已经更重视历史和记录，而不是《圣经》《可兰经》一类的宗教经典。然后，中国人通常会通过比较和研究他们的历史，来了解其他国家和文明。每一个王朝都把编修前朝历史作为意识形态上优先考虑的事。书写历史是树立正当思想与合法性的根本手段。

一个多世纪以来，中国正在经历一个艰难的现代化历程，这个过程，类似于2000年前中国吸收和改变印度佛教的历程，同时中国也被改变，但近代化的过程比佛教来华更深更快。

对于中国人来说，要想充分地理解他们正在经历的事情，了解西方历史也是很重要的。面对西方历史，在某种程度上，中国倾向于划分出国别史。中国如何看西方历史呢？美国历史始于何时，200年前吗，是更早还是更晚？俄国的历史有多久，400年吗，或是更多，多少年？

看来理解西方历史是一个难题。事实上，美国和俄罗斯，还有很多南地中海国家，他们的历史始于罗马帝国，或者长时间与它紧密相连，这段历史持续了2000多年，这些国家继承了古罗马的许多传统。事实上，如果我们看过去3000年的历史，从古希腊和古罗马，到文艺复兴和耶稣会来华，与西方和中国相关的90%以上的历史都可以意大利找到。因此，意大利历史是一面虽然不完全但很独特的镜子，通过这面镜子，中国人可以看到西方历史，也可以更好地理解历史和现在。

中国人始终认为他们与意大利人之间有一种难以割舍的牵连，它不只来自于马可·波罗和利玛窦，更来自于一种对古老绵延的文明深深的感情。尽管西方历史太大太复杂，但是可以透过意大利历史这个锁眼看到西方历史。意大利历史可以说就是西方文明的第一站。此后，可以在想要继续了解的周围方向畅游。

用这种方式，历史也可能发挥别的作用。对意大利历史更熟悉的西方读者，可以从为中国读者写的西方历史书中，找到了解中国的钥匙，通过自己的历史比通过神秘的中国历史更容易接近中国。今天的中国人在寻找什么，他们对意大利历史有哪些好奇？这些也告诉西方人，他们应该怎么看待中国或怎样观察中国。

意大利是地理的还是政治的

在20世纪60年代，也就是我孩童时代用过的意大利历史教科书中，标准的一课，就是批评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对意大利的立场。该书解释了在拿破仑战争之后，1815年维也纳会议重新划定了欧洲的边界和国家，梅特涅驳回了意大利统一的政治理想，并且强化了奥地利对亚平宁半岛的控制，他说过这样的话：“意大利只是一个地理概念。”因此它不可能有政治雄心，只能保持小国林立的状态，其影响力不能越过阿尔卑斯山。



统一的意大利不认同这一言论，因为拿破仑战争实际上给意大利带来了完整国家的意识。

在反奥地利的第一次意大利战争后，18世纪后期拿破仑在北意大利建立了阿尔卑斯山共和国，他给了意大利第一面国旗，与法国国旗只差一个颜色：法国国旗是蓝、白、红三色；意大利国旗是绿、白、红三色。拿破仑的法国认为意大利人很亲近，毕竟拿破仑的出生地科西嘉岛，在1764年是由热那亚卖给法国的。这桩买卖是在一项秘密协议的开始就进行的，就在那时，后来的海军部长舒瓦瑟尔公爵把科西嘉岛镶在了法兰西王冠上。热那亚出售科西嘉，是因为它没能成功地镇压巴伊夸·帕欧里领导的起义，而且它想摆脱那些争取利益的麻烦制造者。1755年，帕欧里宣布了科西嘉共和国的宪法，这可能影响了后来的美国宪法。帕欧里创建了科西嘉的第一所大学。帕欧里把科西嘉人视为意大利人。出生在1769年的拿破仑，来自一个托斯卡纳家庭（波拿巴是一个纯粹的意大利姓氏，意为“好的一面”），他可能也受到了帕欧里的启发，在科西嘉岛被法国吞并很多年后，他的支持者在岛上指挥了一场抗战。

所以，在1815年，梅特涅不相信一个叫做意大利的政治实体，这是对的，而20世纪60年代的意大利历史教科书是错的。梅特涅的“地理概念”也支持了奥地利国君冷血的、现实主义的声明，这成为以后直到亨利·基辛格等一大批外交家的榜样。意大利曾经是罗马帝国的中心，但是不论在这之前还是之后，甚至在帝国时代，许多不同的人住在这里，使用不同的语言，有着不同的习俗。闪米特的阿拉伯人统治过西西里，中亚的土耳其人征服过意大利南部沿海地区；在这之前，曾经有古希腊人认为意大利半岛是一个大希腊；腓尼基人曾经居住在西西里和现代的突尼斯中间；高卢人横跨阿尔卑斯山，居住在波河河谷和现代的法国之间；伊特鲁西亚人，可能来自于安纳托利亚的一支无从可考的族群，留下了难以抹去的痕迹。从挪威来的维京人，从法国、西班牙或德国来的王公或海盗，也都曾到意大利半岛的某块土地上划地为王。

然而，在科西嘉共和国之前，尤其是在1861年那不勒斯王国（统治南意大利）并入萨伏伊王朝（统治北意大利和中部意大利一部分）之前，

从来没有过统一的意大利国家。即使在共和国成立的时候，意大利也没有统一。1866年，威尼斯地区统一到意大利之中，这归因于和崛起的普鲁士人联合，对抗衰落的奥地利。在1870年与教皇国的战争后，罗马和周边地区并入意大利，同时，特兰托和的里雅斯特周边地区直到一战结束的1918年才从奥地利夺过来。

西方历史的简明版本

没有人完全统治过意大利，除了罗马人，但是对于他们来说，意大利只是罗马帝国这个更大的网的中心。在这里，人们说着如万花筒一样各种不同的语言，所以人们可以冷静地假定，意大利没有理由被视为一个统一体。甚至在统一之后，因为在狭长半岛上，大家说着互相难以听懂的语言，意大利仍然存在很大分歧。

但是，也有一些促使意大利统一的因素，很难用一种确定的方式来明确这些因素，但是确实有这些因素。它是一种共同文化：几千年来，人们在一个狭小的地区中彼此交流和斗争，并且把它的影响传播到整个世界，几个世纪以来，这个地方事实上已经成为西方文明的中心。因此，西方历史不能忽略意大利，意大利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是西方历史的简明版本。

即使是现在，当意大利的政治经济衰退了几十年后，意大利还有一些独特的市场生机：拥有意大利面和比萨饼等食物的食品工业席卷世界，足球产业在世界拥有巨额资金，时尚业首屈一指，而且在几乎任何产业领域都拥有数百位杰出人才。

尽管意大利的政治管理很弱，但还是创造了以上这些成绩，这似乎是一个奇迹。或者像20世纪80年代一些政治家说的那样，能有这些成绩正是因为它的政治管理。墨索里尼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：“试图统治意大利不是不可能，而是没有用。”然而，几百年来，意大利人找到了他们自己独特的方法。最重要的是，意大利的影响完全超出了他们的地理边界，为塑造欧洲、地中海和世界作出了贡献。

环球史话

“旧时明月，算几番照我”，齐如山《北平杂记》的基调，是怀念千里之外的古都，写下一些对自己和后人有所眷顾的追忆文字。对于过去的岁月，更多是田园诗般的昨日重现，又仿佛一曲世事无常的沧桑挽歌。

从远古时期九州之一的冀州，到周代的召公封地延续八百年的香火，北平开辟千里、一路走来，“有险峻的关山，有流通的川泽，形势雄强，号为天府”，历代都是国家的重镇。而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变局，也在京畿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冲撞痕迹。一方面，旧时代的道德、规矩，构成了北平街头人文风景，成为后世文人骚客怀旧的经久主题；另一方面，难以掩盖的是昧于世界大势的混乱治理，街头的脏乱差，管理的低效。当时代的列车呼啸而过，这里却只有蹒跚踱步的老马旧车，让人感慨“青山遮不住，毕竟东流去”。

这里不乏老规矩的魅力。“风俗朴厚，人心安静”，不似一些沿海城市，做了不过百余年的商埠后，反而道德信用日渐沦丧，商界行径更是浮嚣。齐如山念兹在兹的，就是北平的“商界道德信用”和传统的信义、谦和的行径。买卖和气，绝不强买强卖，规规矩矩，不卑不亢，绸缎布店听到顾客夸奖自己贬斥别店，绝不顺势自夸，说同行坏话，而是说“也差不了许多”，这样的话在别处是听不到的；顾客挑货，便提醒不必着急；棺材铺永远不顾客客为“老主顾”，而是“百年不遇”；饭馆掌柜终日坐在厨房门口，菜做出来先看一看，不够好就扣下另做，决不能砸了招牌。笑迎八方宾客，商人与官员绝不同席，遇到日子冲突饭馆宁可得罪官员，不可得罪商家；东四牌楼的银号“四大恒”，永远是靠信用生存，其中一家恒和银号哪怕关门歇业，也要等候人们来兑换银票，没有报纸广告，就贴出梅红纸半张广而告之，在路边租一间门面房挂上钱幌子，二十年间不做生意，只为了等候人来持票兑现……这些都是齐如山大谈谈谈的北平掌故。今日北京的“包容、厚德”城市精神，亦可谓渊源有自、系出名门。

另一面则是社会治理的混乱无序。天坛祈年殿多次被火焚烧，折射出救火规矩的荒诞不经，真有点似拉美魔幻小说的情节：凡是殿庭官房失火，官员按理应该前去救火，但是这里的规矩是，官员不必到着火之处，而是到门外一个亭子，投上一个名片便算来了。事后查点名片，哪怕出力再多，没有名片也没用，出力再少，有了名片就算有功。一面无人灭火，一面争相请功，此种规矩居然延续了好多年。

一段马路泥泞崎岖，外国人看破坏太厉害，就要动工修理，中国人则要计算工程款项和私人从中渔利多少，值得动工才上书请修，否则绝不屑于动工，修出的路质量可想而知。黄河开口、河工发财，甚至出现了官员自己挖开河口，拼上一个革职留任以观后效的处分，也要大发财源，最后打堤合龙，结果往往官复原职，人财两得皆大欢喜。

聚拢闲散游民维持社会治安，领头的美其名曰“杆上的”，非官非匪，亦官亦匪，虽不在政府领饷，却一杆在手大权独揽，街头商铺无不看其脸色、多方孝敬，否则必遭欺凌或乞丐堵门，实属恶政。为官不为，颠预推诿，朝野皆如散沙，大为和服外被大监家属霸占，闲杂人等吃喝拉

工作，他自立为西楚霸王，都彭城。有人建议他因秦之资而都咸阳，被拒绝了。项羽的理由是，“富贵不归故乡，如衣绣夜行”。这一次虚荣给了刘邦机会。被封为汉王的刘邦从汉中起兵，迅速占领秦故地关中，并以此为根据地，向项羽发起攻势。而刘邦得以最终取胜的关键，在于承秦之制。

所谓汉承秦制，按陈苏镇先生的解释，包括三个方面。即据秦之地，用秦之人，承秦之制。即以丰饶的关中秦地为根基，收编组织化程度高的秦人为生力军，按照秦人的法令制度安排秦地的生产生活，将秦这架战争机器又开动起来。

取得天下以后，新的政权该向何处去？是继续走秦朝的老路，取东方诸国以奉养秦地，还是走项羽的老路，分封六国后裔统治？

若从前者，汉朝必踵秦之径，天下怕将再度陷入战争局面。若从后者，各地分封为治，莫相统属，又将回到战国分裂的局面。何去何从，考验着布衣将相们的政治智慧。

从芒矡山走出的草泽英雄们，选择了第三条路：将秦统一后施行的郡县制与战国时的分封制结合并存。在原来秦故地，设郡县，承秦之制为治；在东方各国故地，设诸侯王为治，诸侯各有法，各从其地风俗。

于是，秦与东方各国间尖锐的矛盾，被汉初将相高超的政治技巧化解了。诚然，在这种体制下，汉中央政府与诸侯国之间仍存在着对抗和冲突，但这一问题本就不能在汉初得到一揽子解决。否则，汉必将重蹈亡秦覆辙。

历史的经验一再提示：激切的雷霆手段未必能迅速解决矛盾；宽缓的渐进式改革，往往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成效，在未来的变化中寻找解决方法，是汉初将相给出的富含哲理的解决方案。

两汉风云

模 范 的 道 德 失 序 的 治 理

——古都风物可感 旧时风气可叹（三）

□ 胡森森

撤，院中蓬蒿遍地，一人多高从不铲除。这些清史旧闻，多不为正史所采，确是那个时代原生态的鲜活记录。古都风物掩映下，社会细胞层面的腐败呈现出“规模报酬递增”的特征：范围广，层级高，风险小，程度深，深深地嵌入了社会肌理层面，每个人既是受害者又是参与者，陷入一种茫然无措的窒息当中。

昔时人已没，今日水犹寒。文化是精华与糟粕交织的整体，虽然有时候分不清彼此的界限，但逝去的并非都值得缅怀。每一处地域和时代逐渐融入历史深处，都会引发人的冥想、寄托、追忆和凭吊，但故国神游、惆怅莫名是一回事，复古倒退则是另一回事。

文化间的博弈对抗从来都是客观存在的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。文化的战争不一定与枪炮和战火同步，但一定和国家的地位相关联。每一种文化都希望以自己为主体，把他人文化作为客体或对象吸纳、解释，文化复兴就是争夺文化主体性的过程，不能靠他救，只能靠自强。

文化自强的途径不是固步自封，必须选择新的时代要素注入衰老的肌体，才能重新焕发生机。任何药剂既有疗效也有副作用，近代中国自强的过程，就是不断试验药物的选择过程，最终留下自然选择的结果，必然是疗效与代价之间的最佳平衡。

有所思